

语言 言语 交往

鲁
芩 / 著

索绪尔结构语言观 现代语言学的基石
意义的动态生成

利奇语言学 从语义学到语用学

语用学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论

哈贝马斯 从经验语用学到规范语用学

综观论及其他 语用学研究的新格局

语言模糊性 确定与不确定性的辩证转换

文本与解读 关于文本语言再现性的讨论

交往与互动 从语用学看提升语际交往能力的模式转换

从结构语言观到认知语言学

362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海南省社会科学研究资助课题

语言 言语 交往

鲁 苓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 言语 交往 / 鲁苓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6

ISBN 7-80190-225-4

I. 语… II. 鲁… III. 语用学—理论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3780 号

序

海南大学人文学院鲁苓教授新著《语言 言语 交往》脱稿，约我写个序。我与鲁苓教授在学术会议上有过接触，惟印象不深。鲁苓是鲁苓，我是我，一个遥处海南，一个久居京城，但她的新著把我真的吸引住了。鲁苓教授对 20 世纪语言学理论透彻的理解，她对语义理论发展如数家常的描述，她对各种争论不偏不倚的评价，她对新世纪语言学研究走向的关注，使我一下对她有了更深的认识。我想，这就是学术交往的魅力。

本书有不少亮点。首先，贯穿全书的一条红线是围绕索绪尔由语言学理论展开的。作者既充分肯定索绪尔如何实现语言学研究从“经典”向“现代”的转换及其影响之深远，也谈到当代理论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及其“任意性”原则的强有力的挑战。后者的积极意义在于在更深的思想层面上引发了种种问题和质疑，从而规约着当代语言学研究的理论走向。显然，科学的威力就在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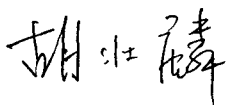
本书的绝大部分章节放在语用学理论的讨论上，诸如对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利奇、奥斯汀、哈贝马斯以及晚近的维什伦，都有专文论述。我们知道，语用学理论的发展是为了解决以“能指—所指”为主导的语言意义所未能解释清楚的问题，但人们在

语言 言语 交往

前进过程中又进一步发现这样那样的不足，如在诸多可选义项中如何界定当下意义，语境的随机性、不可论证性和不可规约性，言语行为的分类标准问题，理想交往理论的不可即性和语义的不确定性，等等。这些都说明，作者的头脑是清醒的。

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单纯讨论 20 世纪语言研究的路向和运动轨迹上，而是将我们的视线引向 21 世纪的思想文化运动的走向，特别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兴起。作者能正确把握认知语言学的基本思想，如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如何从“映像论”发展到“经验论”，如何认识到主体和对象世界交往的实在性。当然，这里的交往比哈贝马斯的“理想交往”提高了一步。本书的书名《语言 言语 交往》恐怕最好地体现了作者的用意。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讨论中能引用马克思的“人化自然”的思想。在当今学界大谈这个“主义”、那个“理论”的时候，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仍不乏其生命力，对我们的研究分析工作仍有其价值。

本书还有不少亮点，如有关语言模糊性、文本解读、互动等专题的论述。我想还是由读者自己去发现、去体验、去认识、去评论。只有这样的互动，才能实现与作者深层次的交往。我预祝鲁苓教授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更大成就。我预祝海南大学文学院涌现出更多优秀人才。



北京大学蓝旗营

2003 年岁末

引 言

语言何以传达意义？这不仅是当代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根本问题，也是现代语言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亦是历来思想家和语言学各理论流派关注的焦点问题。本书所讨论的“语言”、“言语”、“交往”就是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的几个基本论题，语言学（包括语义学、语用学等）各流派大都是通过上述问题的讨论来展开各自的理论界说的。有鉴于此，本书亦希望通过上述问题的讨论，对长期所关注的若干语言学理论流派的主要思想脉络做一个梳理，以期为当代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脉络、样态和趋向等问题的讨论提出一点意见。众所周知，现代语言学的创导者、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现代语言学理论构架的基石，故笔者拟由此进入有关“语言—意义”问题探讨，并就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及其对当代语言问题研究的影响和规约提出几点分析意见。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倡导的传统镜式语言观认为：语言是反映自然实在的一面镜子，语言符号所表征的意义与自然实在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和映现关系。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经典理念经奥古斯丁、洛克的阐发后成为西方传统语言学诸多流派藉以表述各自理论概说的基点。直至 20 世纪，这一沿袭甚久的

传统理念才受到索绪尔的结构语言观的挑战。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首次将语言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对象体系加以考察，以一种注重系统分析和形式研究的方法就“语言—符号—意义”三者的基本关系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他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思想的符号体系，即用以表达思想的语言不仅具有符号特性，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符号体系；确切地说，语言这种符号体系就是由音响形象和概念（意义）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一种结构。为了描述上述关系，在阐述过程中索绪尔选用了两个重要术语：能指和所指，两者合为一体构成一个符号。在一个语言体系中，“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完全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即“语言并不是通过参照‘现实’的模式来构词的，而是根据自己内部的、自足的规则来构词的”（特伦斯·霍克斯，1987：8）。由此可以看出，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这种任意性说明语言不是给独立存在的概念赋予任意的名称，而是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创设自己的关系，即形成相互差异且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

与此同时，索绪尔还进一步强调：语言是由相互依赖的诸要素组成的系统，其中每一要素的价值完全是由于另外的要素的同时存在而获致的。因此，“意义”主要取决于它们在言语链及语法体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各种词语只是根据它们在结构中的关系即语言规范中的差异和类同才获得意义的，没有差异就没有意义。显然，这种差异本身需要阐释，而阐释就会有多种可能性，这就势必导致意义的多元化。毫无疑问，一旦上述观念得以认同，传统镜式（映现论）语言观赖以生存的基石——意义的“惟一性”亦不复存在，所谓语言的意义就是再现自然实在的理念也随之消失了。就语言研究而言，上述观念

的问世无疑是划时代的。它表明：在这里所讨论的意义完全是语言体系内结构关系的产物，是一种“构造”的产物，而不是所谓自然实在的映现之物。或许，这就是索绪尔结构语言观给我们的启示。正因为如此，索绪尔才被学界尊崇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索绪尔的上述讨论不仅仅涉及语言及意义研究的内容，而且还涉及到语言研究方法论问题。在索绪尔的理论构架中，对语言意义的追询不再仅仅关注个别的“语言实体”，而主要关注由诸多关系构成的结构体系，其基本路向则是由外部的、实证的、历时的、个别的考察转向对语言内部的、结构的、共时的、整体的考察。因为，就意义而言，重要的是考察各种语言现象所具有的当下的结构属性。例如，音响形象和书写记号能否称之为语言现象，只有将它纳入语言结构中才能加以判断。而在特定的语言结构中，有意义的语言要素，也只是在语言体系的相互关系中才被赋予意义，一旦超出了这一结构体系，就再也不称其为语言要素了。应该说，索绪尔的上述观念使语言学方法论完成了由“经典”向“现代”的转换；而且，这种将语言作为一种结构和自足体系来进行分析的基本思想后来发展成为被称之为“结构主义”的哲学思潮，遂使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现代语言学领域。

众所周知，自索绪尔的结构语言观问世以后，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领域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这一理论所引发的语言学转向，后者不仅为语言意义理论的讨论提供了全新的视域，亦对20世纪的整个人文科学研究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当代德国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就曾经指出：“语言学转向是迄今为止发生的最深刻、最激进的范式转换。由于这一转换，自古

希腊以来人文科学的基础遭到了严重怀疑，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索绪尔的结构语言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范式，或者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世界的思维方式，即“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特伦斯·霍克斯，1987：8）。显然，这是一种新的意义生成机理。我国年轻学者周晓风博士在他的《现代诗歌符号美学》一书中也指出：“在意义结构中，语言（特别是语言符号）的作用不是一种辅助性的工具作用，而是一种根本性的构形作用。离开了符号的构形作用，主体将不能真正把握对象世界，或者说根本不可能构成对象世界，意义也就无法产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符号不仅表现了世界，而且构成了这个世界。”（周晓风，1995：22）然而，从国内语言学和符号学研究领域来看，大家似乎对索绪尔结构语言观的这样一种阐释关注不多，但后者却在整个西方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仅就语言学领域而言，如本世纪20~30年代发展起来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述语言学派，都是以索绪尔语言观为其理论基石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提出了著名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将语言学研究引入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结构，是一些先验的语法规则，通过转移程序构成了人们日常用语。因此，语言是深层结构，言语是表层结构。人们通常将乔姆斯基奉为20世纪语言学研究之集大成者，其理论构架无不透露出索绪尔语言分析模式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国家形成了被称之为结构主义的思潮，其核心就是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新理论流派之中

的结构主义方法。如在 20 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以雅可布森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皮亚杰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福柯用于研究思想史的“认识型”理论等，都是结构主义方法的产物。当然，难免也有人会提出质疑：语言学理论的变化何以会对整个人文科学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一点是不足为怪的。正如著名语言学家萨皮尔所说：文化的“形态”，或称一个社团总的生存方式，事实上是由那种文化的语言所决定的，或者就是由该文化的语言以相同的方式“结构”而成的。应该说，萨皮尔先生的见解足以消解人们的疑惑。与此同时，人们也注意到，与其他在人类思想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流派一样，索绪尔的意义观在开启了现代语言学大门的同时，为世人留下的依旧是更多的问题，其中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与索绪尔意义观密切相关的文本理论问题。从广义上讲，文本理论问题是一个与意义理论最为贴近的问题；一旦意义理论构架发生根本变化，即前述“构造”的观念成为它的核心理念，势必会引起文本理论的重构。

直至 20 世纪上半叶，人们普遍认为：文本通常是意义惟一且确定的封闭体系，其阅读过程实质上只是对作者固置于文本中的恒定意义的认同。自结构主义语言观问世后，这一“文本”理念受到了挑战。结构主义认为：即便文本体现了作者意欲表达的意义，但文本到达读者手里以后，其意义只能从后者阅读过程中生成。也就是说，意义只是在语言符号被知觉或结构关系被构造过程中产生，因而文本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固有和恒定的意义。

随着对结构主义语言观更为深入的阐发和探究，不少符号

学家和语言学家敏锐地感觉到不仅意义需要在阐释中产生，而且对意义的阐释也需要再阐释，意义就在这一过程中衍生、转喻、延展……从而向人们展示了无比丰富的可能性。如此说来，一个符号的所指总需要别的符号形式来加以阐释，而阐释本身也需借助于符号形式的表达，这又引起另一重阐释……依此类推，就产生了所谓差延（即差异和延宕现象）。这是后结构主义（或称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观的内在逻辑中引申出来的一个概念。因此，前述所谓文本具有单一的结构和明确、完整的意义一说是不能成立的；意义不仅是语言产生的即时效果，而且对每一个符号来说，其所指始终处在“差延”之中，即所指永远在“滑移”之中，只能呈现出一种“踪迹”。文本作为“能指链”，其所指在不断地生成、延伸，但这种延伸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上都是不可把握和规约的，遂使文本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性。恐怕连索绪尔也不会料到，他的理论在摧毁了传统理念的同时，亦被其后继者推演到如此极端的地步——语言符号日益丧失其表征能力，再也不能切中意义本身，以致于文本意义迷失在无尽的“能指链”中。这种状态通常被称为意义的“缺失”。

后结构主义意义观的出现使语言学家、符号学家们深感迷惑，他们又一次深刻地感受到语言学面临的危机。因此，语言学界有不少理论流派对“文本意义缺失”论的源头——索绪尔结构语言观提出了质询和挑战。应该说，上述批评反映了当前国外语言学界的一种理论趋向：企望能以此来调整和校正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轨迹。然而，无论前述相关流派之间交锋结局如何，都不能否认正是索绪尔结构观将语言意义理论研究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视域。在此层面上，我们获得了一种眼界：语言符

号不仅表征了世界，而且它所包涵的意义构成了人们所认识和感知的世界本身。这就是索绪尔结构语言观留给 20 世纪的精神遗产。即便当今很热门的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也透射出这一理念留下的印迹。

认知语言学是一门新学科，其理论构架植根于新兴的认知科学。认知科学的主要流派——经验主义的理论框架可以这样界定：人们对于对象世界的认识不是对外在自然实在的“映照”和对应，而是通过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经验来把握和认识对象世界；在此过程中，认识的主体对对象世界的感知方式以及与对象世界的交互作用非常重要。显然，这一观念不仅强调经验在认识对象世界中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重认知机制对经验的整合效用。总之，认识的主体对对象世界的感知、体验、观察（可以统称为经验）过程占据非常重要地位。应该说，这一基本构架明显带有索绪尔及结构主义理论的痕迹和影响。这一点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这一理论构架的形成得益于索绪尔带给 20 世纪的一种现代语言学的眼界：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我们用语言构成的不同于自然实在或对象世界的感知世界（从广义上讲，即人所体察、认识的世界之图景，就像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人化自然”）。（周晓风，1995：1）由此不难看出，认知科学所强调的认识主体对对象世界的感知、体验、观察（可以统称为经验）这一环节的重要作用的观念明显带有索绪尔的印迹。

其次，它的形成得益于与索绪尔密不可分的结构主义的基本思想：在任何既定的环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景中的其他因素

之间的关系所决定。总之，任何实体或经验的完整意义除非它被结合到结构（它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中去，否则便不能为人们感觉到。（特伦斯·霍克斯，1987：9）正是上述观念的影响，使认知语言学特别注重考察和探究人们在对现实世界的经验过程中主体与世界的交互作用。

与其他理论流派一样，认知语言学对“语言何以传达意义”问题亦有自己独到的阐释和表达。它认为：语言是由对象世界、认识主体的认知活动取向、社会文化的积淀等相关因素共同作用的象征符号体系，语言符号的意义与以人的认知结构为基础的“范畴”概念密切相关，它表征的是一个产生于认知活动中的动态语义范畴。例如，词和概念之意义的生成和延展现象就反映了认识主体借助于隐喻、转喻等认知方式完成的一个词的本意（中心意义）向其他意义的递延和流转的动态过程。基于上述种种观念，认知语言学对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提出了种种质疑。它认为：单个词对应的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以及由它们组合构成的语言结构与意义之间关系均为任意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即使前者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任意性关系，也不能将此推演到更高级的语言平面——句法结构之中。此外，它还认为，语言具有受认知环境制约的系统约定性，因而理据性是存在的；但这种理据性并非源于语言须映证对象世界的传统理念，而是由于认识主体的认知环节的作用所致，因为语言形式对认知结构而言并非是任意的。应该说，上述种种观念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及“任意性”原则来说是一种强有力的挑战，遂使人们开始从新的理论层面和视角切入相关语言问题的探讨。

综上所述，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对 20 世纪语言问题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它使语言摆脱了传统经典理念的桎梏，成为一个与自然实在无关的独立自足的分析对象。

第二，它使人们意识到：人通过语言对于对象世界进行符号化描述，得到一个并不等同于对象世界的感知世界；那么语言符号不仅表征了世界，而且构成了世界本身。正因为如此，语言问题才成为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最重要的问题。

第三，它为语言形式和意义理论的研究开启了巨大空间，亦使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认知语言学这样的理论流派得以在索绪尔所拓展的现代语言学这样一个理论平台上探讨语言和自然实在的关系问题。

毫无疑问，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开创性研究，它深刻地影响和观照着 20 世纪语言问题研究的走向。现在看来，不仅后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等深受其影响，即使索绪尔的批判者也是如此。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重新定义了语言与自然实在的关系，从而将语言形式和意义的研究导向一个新的层面，20 世纪的语言问题研究亦仍在传统经典理念的阴影下蹒跚前行。或许应该说，这就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留给 20 世纪的精神遗产，其意义不仅在于它批判和动摇了传统的经典理念，更重要的是它在更深的思想层面上引发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和质疑，从而深刻地影响和规约着当代“语言—意义”问题研究的理论走向。

应该说，以上的讨论是进入本书所涉及的若干问题的切入点。通过讨论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及其对当代语言问题研究的影响和规约问题，旨在为读者提供本书讨论语言问题的路向、方式的基本模式，以使读者能够较快地进入问题。与国内外语界同类的语言学专著相比，本书展开的是一种跨学科、多层面、

多视角的综合研究，无论是表达、思维路向以及对各理论流派的一些批判性思考均不乏个性化的东西。至此，读者们开始进入具体的讨论，相关讨论的基本脉络如下。

本书的第一章“索绪尔结构语言观：现代语言学的基石”讨论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与20世纪语言问题研究的关系。20世纪初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一书中提出了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其中，“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共时性”和“历时性”之间关系的讨论，以及他提出的所谓“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以及意义生成取决于语言符号体系内部的结构关系的观念，这些对20世纪“语言—意义”问题研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第二章“意义的动态生成”讨论了当代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主张的“意义即使用”的意义观。他认为词义是变动不居的，没有什么恒定不变的意义，而只能视各种不同的语境来确定某一特定的意义；但是，在具体的语境中的任一语言现象的意义又因受到各种使用规则的作用而具有相对的确定性。这些是20世纪语言问题研究中得到广泛认同的主流理念。笔者认为，他的这一观念的提出使语言研究从单纯的静态结构转向动态的与使用相关的诸因素之中，在语言问题研究领域里是一个重要突破；但是，当他面临“在诸多的可选选项面前究竟如何界定该词的当下意义”问题时，又陷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循环论证，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第三章“利奇语言学：从语义学到语用学”从对比分析的角度切入当代英国著名语义学、语用学家利奇的意义观。尽管“意义即用法”的观念得到广泛认同，但利奇却认为它过于空泛和抽象，无法进行分析和验证。其原因在于维特根斯坦的理论

基点——“语境”是一个随机的、不可论证的、不可规约和分析的对象，我们无法将它作为将语言学（主要是语义学和语用学）这样一门科学讨论有关问题的基点。有鉴于此，他就语境之于意义的确认的作用提出了一种分析模式；尽管只是一家之言，但也不失为一种可供深入讨论的模式。此外，这一章还讨论了与此相关的意义与含意、语义等同性与深层语义结构问题。

第四章是“语用学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论”。人们普遍认为：语言用于表达思想和叙述事实，它只有描述功能，因而理解和判断语句的惟一标准就是逻辑语义的真值条件。深受维特根斯坦影响的英国哲学家奥斯汀以其对语言的敏锐感觉和独到的分析探讨了语言使用（即特定语境中的言语行为）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语用学重要理论——“言语行为论”，遂将有关意义问题讨论从语词在表达式中的形式关系（是否满足逻辑语义的真值条件）扩展到语言使用的诸要素，即言语的语境、言语者的意向等语用学要素之中，从而大大地拓宽了语言的意义空间。这一理论界说对语言问题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在此章节的相关讨论中，笔者就奥斯汀及塞尔相继阐明的言语行为分类标准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第五章“哈贝马斯：从‘经验语用学’到‘规范语用学’”讨论当代德国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的语用学思想。虽然哈贝马斯承袭了“言语行为论”的基本思想，但他认为，某一话语所表达的意义并不是由其所在的特定语境所决定的，而应该由语用学规则（即运用语句的规则）所构成的言语的“一般情景之规范性质”所决定；从而主张对言语行为不能仅仅限于经验分析，必须而且能够进行规范分析。据此，他提出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力求考察一般语言情景之下的言语行为的普遍意义，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特定环境下言语行为的特殊意义的考察之中。这一点与利奇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讨论中，笔者认为哈贝马斯的语用学理论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理论模式，它要求一种理想的交往、沟通程序，而且交往沟通中的主体也必须沐浴在理性的光环之中，因而也有明显的缺陷。

第六章“综观论及其他：语用学研究的新路向”讨论了20世纪90年代末比利时著名语用学家维什伦在其新作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语用学新解）提出的“综观论”（*a perspective on language*）及“顺应理论”（*theory of adaptation*）等一系列新观念。他认为，语用学对语言使用问题的研究路向不能仅仅拘泥于奥斯汀、塞尔及格莱斯等人提出的各别的语言研究单位——言语行为、指示语、预设与前提、会话含意等，而应该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探讨语言的认知、社会和文化等复杂因素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的作用，以展开对语言使用各种相关因素的综合研究。本章节中，笔者拟按照维什伦的思路和表达方式，以一种并非纯粹的语言学方式讨论其语用学思想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差异及界面。

第七章“语言模糊性：确定与不确定性的可逆转换”主要讨论语言模糊性问题。语言模糊性对语言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讨论极为重要。西方思想界有关于此的探讨源远流长，无论哲学和语言学都是如此。本章节的讨论对此做了一个清理，并就语言模糊性的语义学属性、存在理据及其在语言使用中的功用进行了讨论。

第八章“文本与解读：关于文本意义的讨论”主要讨论语言使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文本与解读，其中就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等理论流派在“作者—文本—读者（译